

目 录

-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2)
- 二、抗日战争时期…………… (12)
- 三、解放战争时期 (一)…………… (21)
- 四、解放战争时期 (二)…………… (32)
- 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41)

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初稿)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表現得十分尖銳、複雜、激烈。鬥爭的焦點是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是要不要革命武裝，要不要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問題。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科學地分析了當時形勢，英明地指出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必須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必須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毛主席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紅軍，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而林彪追隨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對革命悲觀失望，反對武裝奪取政權，反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反對黨的領導，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南昌起义后，开小差逃跑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党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为了回击敌人的疯狂气焰，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林彪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头，就露出了他的贪生怕死的丑恶灵魂。在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身为连长的林彪，曾经私自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由于国民党沿途搜索，打人杀人很厉害，他怕被抓走杀掉，才不得不返回部队。以后，他又多次不执行命令，擅自撤退和逃跑。如：一次他在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遭敌袭击的战斗中，毛主席指示他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他却对这一指示根本不理，竟从毛主席身边一冲而过，率队逃跑：只顾自己保命，不管毛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

在革命队伍里，贪生怕死，当逃兵，是最可耻的。我们革命战士，为了革命利益，不怕苦，不怕死，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崇高品质，而林彪与敌人一接触就向后跑，枪一响就吓破了胆，他的灵魂深处是多么卑鄙。

林彪这个临阵脱逃的行径，是从孔老二那里传下来的，孔老二曾经称赞从战场逃跑的人。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鲁国人跟着国君去打仗，打了三次，三次临阵脱逃。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家里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在战场上，父亲就没有人奉养了。孔老二听到后说，好啊，好啊，还吹捧他是

个“孝子”。这实际上是宣扬逃跑有理、叛徒光荣的谬论。法家韩非、王充在引述这一事例的时候，曾经尖锐地指出，孔老二认为是“孝子”的人，正是国家的叛徒。赞扬这样的人就没有人为国家打仗，国家就要灭亡了。林彪秉承孔老二这种反动思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犯再犯，一直发展到投修叛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粪堆。

可是，林彪及其死党为了掩盖罪行，竟篡改历史，无耻地把朱德、陈毅同志率领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说成是他带去的，甚至把朱德同志当时使用的扁担，放在林彪展览馆里，也说成是他的。事实上，南昌起义时，他不过是个排、连长，而且是这样一个逃兵，他无耻歪曲历史，这只能说明他的阴谋和野心，而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悲观动摇

一九二八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英、美、日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殖民地的斗争已十分尖锐，蒋、桂、冯军阀混战局面已经形成，反革命潮流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形势，用“星火燎原”来比喻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指出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正在这时，湘赣军阀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白色恐怖面前，林彪对革命产生了动摇，他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谬论，根本不相信中国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根本不相信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建立红色政权。他认为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并提出所谓“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搞流动游击的谬论，竭力反对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理论和路线。

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中，都深刻阐明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伟大意义，毛主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农村根据地，是红军保存和发展自己，抵御和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战略基地。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才能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瓦解和动摇反动统治的基础，才能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促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相反，如果没有根据地，四处乱撞，搞流动游击，不但不能争取群众，更谈不上建立政权，这样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使革命归于失败。

林彪的所谓流动游击道路，就是走州过府、大吃大喝、招兵买马、逃避斗争的道路；也就是不要根据地的流寇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但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而且在敌强我弱，交通技术进步的今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林彪军事上的流动游击，来源于政治上的右倾悲观，他夸大反革命的力量，不相信中国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对此，毛主席曾经给林彪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封长信，信中说：“我以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你对于时局估量比较悲观的原因，……就是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这就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右倾思想的本质。

林彪长期以来坚持错误路线，对毛主席的批评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九年，他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说自己“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灯原”，搞反攻倒算，为自己涂脂抹粉。但是，历史是歪曲不了的，林彪的一首反动诗词，能把当年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儒夫，变成志壮的勇士吗？能把当年流寇主义的代表，变成坚信马列的英雄吗？不能！这只能是他的痴心妄想！毛主席说：“在危險环境中表示絕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的人，只是儒夫与机会主义者”。林彪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鼓吹短促突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围剿”。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了总兵力共达二百一十万人，妄图把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当时，“围剿”与反“围剿”成了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毛主席向全党明确指出：“我們發展的命运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围剿’”。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毛主席提出了“誘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整套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制定了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战略战术。英勇的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猖狂进攻。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乱了蒋介石的手脚。他慌忙在庐山搞了个军官训练团，請了帝国主义分子当顾问，挖空心思，研究出一个新战术，即所谓堡垒推进政策。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大筑其乌龟壳，妄图以此

蚕食苏区，消灭红军。

当时，窃据党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王明，根本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全盘否定已被斗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他在敌人采用堡垒主义新战略的第五次“围剿”面前，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处处抵御，分兵把守”等一整套消极防御的所谓新原则，把党和红军推向了危险的边沿。

林彪追随王明的消极防御。他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到九月六日期间，就连续向军委发了三份电报、两封信，竭力主张堡垒主义和短促突击，并写了《论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他胡说什么：“我们对堡垒如运用得当，那是有很大作用的”，要部队“守在碉楼内，在碉楼掩护下做群众工作。”他还攻击诱敌深入的方针，“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胡说“我军固如经常集结一处，无英雄用武之地”，“我们也仍只能行短促突击，而且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等等。《论短促突击》这篇反动文章，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谬论，渗透了儒家消极防御的毒汁，是他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恩格斯说：“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防御的积极防御”，“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武器，也必败无疑。”林彪、王明搞消极防御，反对诱敌深入，鼓吹以堡垒对堡垒，打短促突击的阵地战；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鼓吹分兵抵御打消耗战，实际上是要丧失我军主动权，葬送中国革命。

林彪这个消极防御的思想，从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看，与儒家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孟轲就是搞消极防御的，他在滕国就主张高墙深沟，专守防御，说什么打败了也是天老爷决定的。法家不是这样，如公元前三四一年齐魏马陵之战，齐国的军事家孙臆就运用了减灶诱敌深入的战法，于马陵地区（今山东鄆县东北）把十万魏国军队打败，最后迫使魏军主将庞涓自杀，还活捉了太子申。汉武帝抗击匈奴，他用了卫青、霍去病两员大将，采用主动出击，避实击虚，奇袭敌人后方的方法，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打败了匈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判地吸收古代军事家的优秀遗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如果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红军的主力向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突进，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威胁敌人的心脏重地，迫使进攻苏区的敌人回援，就能造成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这样，置敌人的堡垒于无用，而红军十分主动，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王明、林彪之流拚命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他们畏敌如虎，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围剿”面前惊慌失措，没有胆量打到敌人后方去，又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剩下来的只有一条失败的道路。事实的结果就是这样，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百分之百，红军由三十万人剩下两万余人，这是多么深刻的血的教训。

毛主席说：“据我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軍事書，任何一个比較聪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战略战术沒有不反对消極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

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而林彪正是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的最愚蠢、最狂妄的人！

在长征路上，大搞分裂活动

红军长征开始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再一次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在血的教训中，一致要求结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强烈希望毛主席回来领导党和红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全党全军的心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王明错误路线的深渊中得到挽救。从此，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率领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在这个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林彪却跳了出来，对抗毛主席的灵活指挥，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一是对抗军委命令，不到扎西集结。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本来打算由宜宾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由于张国焘没有按照中央指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彭德怀土城一仗未能消灭敌军，而蒋介石已调动部队沿江布防，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时刻，毛主席毅然改变原定计划，决定在四川、贵州、云南边境地区寻求新的战略机动，这样就使敌人摆下的阵势没有一点用处，而我军安然地摆脱了困境，争取了主动。这无疑是灵活杰出的指挥，是一次具有伟大气魄的战略行动。但是林彪出于他机会主义的本性，疯狂地对抗这一命令。从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至八日，军委前后八次电示林彪，要他向扎西（威信）集结，林彪却一再

专横地说：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擅自把部队带到罗海，与主力愈离愈远。

二是右倾动摇，不敢攻打娄山关。

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敌人拚命尾追，后面空虚，毛主席率领红军掉头东进，占领了桐梓，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把遵义黔军，调往娄山关及其以南的板桥、黑神庙地区，蒋匪吴奇伟纵队也从贵阳向遵义赶进。军委决心迅速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开展战局，命令林彪立刻迂回娄山关、黑神庙之敌。但林彪说什么正面攻打娄山关“兵力用不上，且系仰攻”，“赶到娄山关以南，但必极疲劳”。他夸大困难，不敢迅速攻取娄山关。而当占领了黑神庙、板桥地区之后，又动摇徘徊，不敢直下遵义，发展胜利。在军委的批评和督促下，在友邻的影响下，林彪才不得不向遵义前进。我军凌晨进遵义，中午吴奇伟部队也即赶到。但敌人晚到一步，我已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击退了吴敌的进攻。如果按照林彪的右倾思想，不但要蹉跎这一即将取得的胜利，而且必然会使红军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三是勾结彭德怀，反对毛主席领导。

遵义战役胜利后，中央红军北上仁怀，转而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取得了长征中决定性的胜利。红军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穿插于敌人之间，生龙活虎，处处主动。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北上却又南下。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被我牵着鼻子走，处处被我调动，疲于奔命。红军广大指战员切身体会到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英明正确，兴高采烈，斗志昂扬。而林彪却蠢蠢

切切，精神沮丧，把毛主席灵活的战略指挥，诬蔑为“拖垮部队”。渡过金沙江后，林彪又叫嚷什么这样下去不成。一到宿营地，他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什么：“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并写信狂妄地要毛主席下台，真是嚣张之极。

在长征路上，林彪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可耻角色。但他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长征先锋”的模样，掩饰自己的错误，扩大自己的影响。历史是歪曲不了的。反党的先锋，搞阴谋的能手——这才是林彪的真面目。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在我军刚刚建立的时期，林彪就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没有改变，在他的灵魂深处早已埋下了野心、阴谋家的种子。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内两条政治路线和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中心，是要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要不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问题。毛主席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我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路线，并根据在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给我军明确规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而王明却从极“左”跳到极右，与叛徒刘少奇一起，荒谬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竭力推行投降主义，妄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依赖国民党。这时，自称“一贯正确”的林彪又破门而出，跟在王明、刘少奇的屁股后面，拚命反对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方针；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双手送给国民党。

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依赖国民党打大仗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毛主席预见到抗日群众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党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

量，要猛烈扩大红军，并规定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但是，林彪却拚命抵制中央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他八次蛮横地提出，不在一方面军工作，要到陕南打游击，并以不干为要挟，说什么“宁肯受处分”，也“不改变决心”，与党闹独立。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党中央指示，开赴华北、华中前线抗日。一九三七年八月党召开了洛川会议。会上，毛主席指出，国民党虽然被迫参加了抗日，但是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时刻企图消灭或削弱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绝对领导的原则。林彪参加了洛川会议，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是知道的，但是他一到华北前线就鼓吹什么“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任务”；而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竭力主张我军“集中统一师兵力”在国民党的统一指挥下打运动战。他无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身上，又一次暴露了他右倾投降的真面貌。

关于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毛主席曾经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毛主席说：“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由于敌强我弱，敌就占领了我国广大的地盘；由于敌小我大，敌人兵力不足，在占领区不得不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

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敵鬥。”如果輕視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不去發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壯大人民軍隊，而採用集中主力去同日寇硬拚的話，那麼，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非但沒有取勝的可能，反而會招來嚴重後果；而敵人卻可占我大片領土，毫無後顧之憂。這樣，要戰勝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的。因此，毛主席明確指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種拿手好戲，……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大仗為主。“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

而林彪卻把毛主席的指示當作耳旁風，他根本無視游擊戰爭，看不起抗日武裝力量，反對我軍分散作戰，他腦子裡沒有黨，沒有群眾，沒有人民戰爭，只迷信國民黨正規軍，硬要集中我軍主力配合國民黨打大仗，打陣地戰。這是非常荒謬的、也是十分有害的。一九四〇年秋，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就是一例。彭德懷擅自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的力量，使日軍把百分之七十五的侵華兵力和全部偽軍集中進攻解放區，實行了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給抗日革命根據地帶來了很大損失，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教訓！

林彪輕視游擊戰，要打陣地戰的思想，與儒家軍事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儒家主張“不鼓不成列”，要打“堂堂之陣”。林彪也是要擺開攤子，拉開架子打所謂“堂堂之陣”。說到這兒，使我們想起了春秋時候的宋襄公和成筮君的两个故事：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國與強大的楚國作戰，宋兵已經

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没有排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尖锐批判。楚汉相争时，赵国的成安君（陈余）也是和宋襄公一样的人物。当汉军进攻赵国的时候，成安君不听李左车迂回敌人后方，截断敌人补给，两路夹击汉军的建议，说什么，讲仁义的军队不搞偷袭，要明着干，结果全军覆没，成安君自己被杀死，赵国也灭亡了。三国时的官渡之战，袁绍的谋士建议偷袭许都，袁绍不听，形成了在官渡地区与曹操消极对峙的局面。而曹操抓住战机，敢于亲自率领五千骑兵，打着袁绍的旗号，乘夜晚偷袭鸟巢，取得了打败袁绍，统一北方的决定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的战术比儒家灵活，法家讲究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孙武子就说过“勿击堂堂之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是讲灵活的。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建筑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这同林彪与儒家机械、死板的战术，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脑瓜里装满了孔孟之道的林彪，不可能理解当时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他把国民党反动军队视为神物，蔑视新生的、发展的抗日武装，这是他本质的本质决定的。

大写反动文章，反对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

在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右倾怕死的林彪，以养病为名，躲到苏联去了，一去就是几年。一九四〇年，正当国民党猖狂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他在莫斯科公开发表了《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大肆鼓吹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武装。他完全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扮演了可耻的叛徒角色。

在这篇反动文章里，他叫嚣“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这实际上是出卖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把党对抗日战争中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蒋介石。关于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权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毛主席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又说，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这个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并告诫全党：

“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但是林彪却竭力追随王明、刘少奇，把国民党蒋介石捧上了天，而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完全站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林彪还无耻地捏造什么是蒋介石建立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眼里，只有蒋介石才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以，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蒋介石国民党来领导。这完全是公开的叛卖。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这是人所共

知的事实。蒋介石的抗日，完全是被迫的，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破坏和捣乱。谁都知道蒋介石是国民党中顽固势力的代表，这是任何人也颠倒不了的！

林彪把蒋介石吹捧为“最高统帅”，硬要把我军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这反映了儒家的正统思想。几千年来，儒家总是灌输“君君”“臣臣”“名正言顺”的反动思想，以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林彪吹捧国民党蒋介石，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当作正统，把我军看作“异军”，完全适应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推行的是阶级投降政策，与无产阶级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篇反动文章里，林彪鼓吹什么一切中国军队服从国民党“统一的司令部”，要八路军、新四军服服贴贴地听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指挥和调动。关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依靠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还是依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真抗日还是假抗日，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实上，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面对共产党实行疯狂“剿灭”的政策，一面加紧出卖中国。林彪却在这篇反动文章里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竭力歌颂国民党反动军队如何“英勇作战”，如何“战果辉煌”，而把我军说成是微不足道的“配角”、“偏师”。事实是，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国土后，国民党军队总是望风而逃，溃不成军，当时群众说他们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八。”有的不战自降，为日寇帮凶；有的打家劫舍，鱼肉人民。这正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真实情况。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抗击着百分之六十四

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这些铁的事实，不是林彪的谣言所能颠倒的。

在这篇反动文章里，林彪根本不提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这与他以前反对做群众工作，反对创建根据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离开了群众，就谈不到抗日的胜利。毛主席教导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平原作战》和电影《地雷战》、《地道战》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军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史实。林彪却不把群众放在眼里，竟诬蔑人民群众只知恭喜发财，妻子儿女，油盐酱醋柴。说明他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看不到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他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进了机会主义的死胡同。

林彪蔑视群众的思想，与儒家也是完全一致的。孔老二把人民群众看作小人。宋朝的大儒司马光就反对武装群众，说什么武装的群众是一群绵羊去与虎豹打仗。蒋介石虽然被迫抗日，他的反动本质决定他不敢发动群众，只能鼓吹所谓“政府抗战”。儒家的这些思想在林彪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他反对发动群众，反对游击战争，也是必然的。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真正扛起抗日大旗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使日本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的胜利，是

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由一九三七年四万多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多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多万人，根据地也发展到一亿多人口，这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大作用，而且为以后的解放战争打败蒋匪帮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歪曲历史，妄图把抗大的功绩记在自己帐上

在抗日战争中，党为了培养干部，积蓄革命力量，举办了抗日红军大学，也就是举世闻名的“抗大”。毛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确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校风，并且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亲自给抗大学员讲课。毛主席在领导抗日战争的艰巨繁重的工作中，对“抗大”的教学内容，教材的编写，教学的时间分配，教员的调配，以及学员的生活等都十分关怀，不断给予重要指示。“抗大”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十几万优秀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林彪有意歪曲历史，妄图把抗大的功绩记在自己账上。他的死党为了给林彪制造政治资本，到处散布什么是林彪主办“抗大”，培养了大批干部，对革命胜利起了伟大作用的谎言。并十分卖力地建造“抗大纪念馆”，举办“抗大展览”，突出地宣扬林彪。林彪究竟在“抗大”做了些什么呢？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调到抗大学习，同时担任了校长，一九三七年八月就离开了“抗大”。以后，林彪在延安养伤

期间，在抗大作了几次报告。错误很多。例如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林彪作了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报告，毛主席五月十四日对这一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有些不适合的地方……

“无条件的进攻”一语不妥，进攻也是有条件的，所以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一九三八年八月，林彪在“抗大”干部会上作了“军队的领导问题”的报告，他根本不谈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公然鼓吹“军队只有命令没有民主，”“在军事上有了民主就遭透了”的谬论，露出了他军阀主义的凶相。以后他又躲到苏联养病去了，一九四二年一月，林彪从苏联回国，路过兰州时，和国民党要人打得火热，成为当时报纸的重要新闻，他还得意洋洋地说，这里长官对我很优待。回到延安以后他吹捧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指责我们党与国民党谈判搞的不好，一再要求中央派他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磨擦。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给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抗日战争中，林彪完全站在王明、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一边，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吹捧蒋介石，反对党对抗战的领导，别有用心地宣扬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对党对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解放战争时期(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负的斗争时期。我们敢不敢同貌似强大的蒋介石集团作斗争？敢不敢胜利？要不要坚持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就是这一时期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策略，领导全国军民同蒋介石匪帮进行了针锋相对、英勇卓越的斗争，从而迅速地转变了敌优我劣的形势，仅仅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埋葬了蒋家王朝。

但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一再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始，他反对毛主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散布对国民党的和平幻想，推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继而，又对抗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荒唐地主张死保城市，以主力对主力 and 敌人拚消耗。后来，又反对毛主席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推行平分兵力、死打硬拚、打击游击战、消耗战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到了战略决战阶段，他的右倾保守主义军事路线暴露的更为明显，他顽固对

抗毛主席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肆意破坏毛主席既定的作战部署，一再抗拒毛主席的作战命令，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犯下了滔天罪行。

现在，我着重批判林彪对抗毛主席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罪行。

辽沈战役，是战略决战阶段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个大战役。这一战役，歼灭了蒋介石的一个强大的战略集团，总共四十七万人，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实施和解放全中国开辟了新的局面。在辽沈战役过程中，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敢于决战还是回避决战，是封闭蒋军在东北的退路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还是留出通路放敌入关。在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林彪都极力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一、林彪反对毛主席把战役主攻方向 指向北宁线的作战方针，不敢把 蒋军封闭在东北就地全歼

在东北战场进行决战，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那里，才有利于战役的发展，有利于就地歼灭东北之敌，有利于全国战局，这是作战指导上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毛主席在对东北战场的敌我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判断后，明确指出，主攻方向应指向北宁线，“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綫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諸点”。毛主席提出的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方针。因为：第一、北宁线上的“锦、榆、唐三

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第二、在北宁线上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敌军出来增援，便于在运动中将其消灭。第三、南下北宁线，是向敌人侧后进攻；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敌人就愈易陷于被动。第四、在北宁线上作战，在战略上正是中间突破的方法，可以切断华北与东北之敌的联系，为我军尔后向两翼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林彪却拒不执行毛主席南下作战的指示，百般地干扰、破坏、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毛主席就电示林彪“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又电示林彪：“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有利”。然而，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却编理由，说假话，欺上瞒下，消极避战。起先，他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主张将东北主力留在北线；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又装模作样地派了两个多纵队的兵力，在长春外围打了一下，随即又提出对长春要“久困长围”。这样，既不南下作战，又不攻打长春，在长春、沈阳之间转过来转过去，足足拖了三个多月。经过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多次批评、督促，林彪才改变腔调，口头上接受了南下作战的方针。但紧接着又接二连三地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和借口。其一，是要华北部队派兵围攻大同，牵制华北敌人，公然声称“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华北部队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其二，是夸大北宁线上的敌情，说北宁线上敌情有变化，现在不宜行动；其三，是粮食有困难，防雨装备不齐全，不能行动等等。真是胡诌白捏，无耻到了极点！对此，毛主席给予严厉的驳斥和批评。毛主席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

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林彪的种种借口和狡辩被毛主席批驳后，又另耍花招，提出要“留出大的力量”放在沈阳附近，以便对付从“长春撤退之敌”和沈阳出援之敌，主力仍然不肯南下。针对这一错误主张，毛主席在回电中进一步对全国战局和东北作战方针作了全面分析，着重指出：**“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至此，林彪才不得不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旬部署部队南下。

为什么林彪对毛主席南下作战的指示，一拖再拖，一抗再抗，呆在北线，按兵不动呢？他曾不打自招地说过：如果东北部队先于华北部队行动，就会“吸引很多国民党军队到关外来，过早打就过早背，这对东北不利”。一语道破了他的天机。他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想的是他那个小天地的利益。他把党的军队看作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想把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东北根据地据为己有，占山为王，称霸割据。用意是多么阴险，灵魂是何等卑鄙！

二、林彪反对毛主席集中兵力迅速攻克锦州的作战部署，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正确地选择了决战的方向，并不等于决战的胜利，还必须正确解决决战的部署问题。我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主要力量放在那里才能取得战役主动权？毛主席全局在胸，一再指

示林彪，部队南下后，应迅速攻克锦州、义县、锦西，完全控制北宁线，并明确指出：“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因为，从地理条件上讲，锦州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要点，是东北敌军取得关内增援、补给的枢纽地带，也是敌人从陆上向关内撤退的必经要道。打下了锦州，就卡住了东北之敌的脖子，扼住了他的嗓子眼儿，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从敌人兵力部署来看，锦州守敌八个师，配置分散，战斗力不强，便于我分割围歼，胜利把握很大；从战役发展趋势来看，我打下锦州，才能调动敌人，逼迫敌人决战，有利于我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主力。这无疑是一条无比正确的作战方针。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林彪又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林彪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锦州经常住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八月六日林彪又提出在攻克北宁线上的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城后，转攻承德。还是不打锦州。当辽沈战役的序幕揭开以后，他在九月二十六日致电军委，又想避开锦州，先打山海关。真是嚣张到了极点！对此，毛主席在第二天给林彪的电报中，耐心地作了利弊分析，再次指示他先打锦州。然而，到十月二日，正当我东北野战军歼灭了义县、兴城、绥中等城守敌并继续扩展攻势的重要关头，林彪又为葫芦岛可能增加少数敌军，这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所动摇，荒谬透顶地提出要把主力拉回北宁线去攻打长春。为此，毛主席对林彪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林彪为了对抗毛主席

首先攻取锦州的作战方针，从九月上旬到十月二日长时间内，迟迟不集中兵力于锦州地区，而是将主力三三三剩一，平均使用于长春外围和长、沈之间，新民西北地区，及锦州、义县地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和集中主力坚决攻克锦州的指示。还有，当东北大军南下打响了辽沈战役后，林彪的指挥所却迟迟不动。在毛主席三令五申催促之后，才从哈尔滨市南移八十公里，到了双城，而离锦州还有八百多公里。就这样，林彪与他的老婆叶群分手的时候，两人还抱头大哭地说：这次我们就见不到面了！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由于毛主席多次批评，并在十月三日严令他在十天内外攻取锦州，他才不得不开始向锦州集中兵力，并于十月四日将指挥所移到阜新。毛主席为了坚定林彪攻克锦州的决心，在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期间又连续致电林彪，详尽地分析了各路援敌的情况，再三告诫林彪不应动摇决心。由于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坚持了既定的作战方针，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才取得了锦州作战的胜利。锦州的解放，击中了敌人要害，使我局面大开，战役形势急转直下。十月十五日，我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集团十二万人；十九日，长春守敌十万人，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的震撼下，除一部起义外，其余被迫投降；紧接着，又按照毛主席预定的作战计划，于二十七日将增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十一个师十万人，全部歼灭于大虎山地区。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置长、沈两敌于不顾，集中兵力首先攻克锦州的方针是多么英明！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佩服的五体投地。锦州解放后，被我活捉的锦州守敌

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十分感慨地说：贵军神机妙算，奔长春，舍沈阳，突然闪击华北，此着厉害。锦州犹如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负华北，贵军拿下锦州，犹如从中间折断扁担，扼住我军战略咽喉重地，非雄才大略之人不敢冒然此行动。

那么，林彪为什么一再抗拒毛主席关于首先攻克锦州的指示呢？他是惧怕敌人，既怕锦州敌人啃不动，又怕援敌夹击吃不消。因此，他就绞尽脑汁想了一条对长春“久困长围”之计，企图得一箭双雕之功。一方面他可以以此作借口，逃避上级和广大指战员对他消极避战的谴责；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冒不大风险捞到一些地盘。如果按照林彪的主意先打长春的话，那么势必把几十万敌军象赶鸭子一样放进关内，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困难，影响全国战局的发展，破坏毛主席战略决战的全面部署。而让国民党反动派得到喘息机会，重新纠集力量，继续对抗人民革命的洪流，推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林彪的主张，不但愚蠢之极，而且反动之极。

三、林彪抗拒毛主席关于堵塞东北敌人海上退路的指示，拒不派兵控制营口

东北之敌主力大部被歼后，能否一个不剩的就地全歼东北残敌，完全实现毛主席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当时，迅速派兵控制营口，堵塞敌人海上退路，就成了实现战役意图的关键。因为，当我军攻克锦州，切断北宁线，歼灭廖耀湘兵团后，营口便成了敌人逃跑的唯一通路。毛主席英明的预见

到敌人的这一阴谋，曾七次急电林彪以足够兵力阻敌南逃，并控制营口，堵塞敌人。毛主席指出：“你们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探取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并告诉林彪，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军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攻打长春的大部分兵力，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毛主席甚至对兵力部署也做了具体指示，要林彪以“七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跑，其中应有二至三个较有战斗力的师”。“南满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队，均应使用于对付鞍山、海城、牛庄地区之敌。”但林彪却置若罔闻，他不仅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迅速派兵控制营口，相反地却把辽南方向仅有的一个独立师撤了出来。致使敌人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及三个团从营口入海逃跑。对此，毛主席对林彪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林彪就是这样，在敌人已经土崩瓦解，我军即将取得全胜的大好形势下，仍然畏敌如虎，根本不敢抽调兵力堵塞营口，一味推行一面平推的击溃战，只想把敌人推出东北了事，这是林彪破坏毛主席将卫立煌集团全歼在东北境内的又一罪证。

这些生动的斗争纪实充分说明，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高度作战指挥艺术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胜利。

四、从辽沈战役两条军事路线 斗争中得到的教益

伟大的辽沈战役，已经过去二十六年了，随着这一战役的胜利结束，林彪对抗毛主席战略决战思想和战役指导方针的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也宣告彻底破产。但是，这段斗争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值得记取的深刻教益。

1. 能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是能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地分析形势，才能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策略，指导革命胜利发展；错误地分析形势，必然造成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导致走上机会主义的邪路。在决战前，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估量阶级力量，透过军队数量对比上我暂处劣势的现象，抓住形势发展的本质，敏锐地看出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及时抓住有利战机，正确地定下战略决战的决心，并正确地选定决战的方向。而林彪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形势，错误地估量阶级力量，他被国民党“中央军”的所谓优势装备、完备工事等表面现象吓得丧魂失魄，看不到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向背，军心动摇，必然覆灭的命运；看不到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人心所向，士气高涨，不可阻挡的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感触到决战时机的成熟，也就必然不敢决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必然导致两条

路线的尖锐分歧，两种不同阶级的估量，必然引出两种根本对立的战略指导。只有“**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採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总结这一斗争历史，就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反对一切儒家和剥削阶级所固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客观地考察战争，使我们在制定作战方针、计划时，符合客观现实，不断推动战争和社会历史向前发展。

2.是不是坚持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在辽沈战役中，毛主席胸怀伟略，通观全局，抓住关键，果断决定置长、沈之敌于不顾，南下北宁线，首战锦州。因而，使我处处主动，获得大胜。而林彪却鼠目寸光，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因此，在战役指导上就必然无真知灼见，就必然抓不住要害，就必然搞军事分散主义。

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批判林彪破坏战争全局的罪行，不仅要从思想上懂得全局决定局部的道理，增强全局观念，而且要彻底批判以“为我”为最高信仰的剥削阶级世界观，树立“立党为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行动上严格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善于关照全

局，保证我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地去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更大胜利。

3. 敢不敢坚持斗争，是能不能胜利的前提条件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辽沈战役前和辽沈战役中，从战役部署到战役指挥，林彪无不对抗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正确指示。只是由于毛主席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斗争策略，对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不断挫败了林彪的干扰和破坏，才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得以实现。

我们总结这段斗争历史，就要以毛主席为榜样，以革命利益为准则，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批判孔孟“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腐朽没落的中庸之道，坚持不懈地与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破坏党的作风、损害部队建设、阻碍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更要**以势如破竹和横扫残云的革命气概**，同历史上一切儒家的意识形态斗，同他们的军事思想斗，同林彪的反动军事路线斗，不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决不罢休！

解放战争时期(二)

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使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敌人。这就为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了不让敌人获得喘息机会，继续大量地消灭敌人，使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早日到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适时的在华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

当时，盘踞在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六十万人，在辽沈、淮海战役的震撼下，已成惊弓之鸟。他们预感到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将落在他们头上，是逃是守，矛盾重重，决心难下。将兵力部署在唐山、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家口、归绥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既准备固守大城市，负隅顽抗，又盘踞在主要交通线和港口，准备西窜绥远或由海上逃跑。因此，稳住敌人，不让敌人逃跑，不让敌人收缩，是全歼华北之敌的关键。毛主席摸透了敌人的规律，抓住了敌人的要害，亲自制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就是：首先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稳住敌人，不让逃跑；尔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吃掉。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毛主席从战役全局和战役部署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英明措施：

命令淮海前线我军对已包围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之残敌，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以免敌人早下决心向

南逃跑。

命令太原前线我军缓攻太原，麻痹敌人，不使发现我军的战略意图。

命令华北杨罗耿兵团暂时不打被困于新保安的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使敌人舍不得抛下主力，定下从海上逃跑的决心。

命令山东我军主力集中一部分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防止平津之敌沿津浦线向青岛方向逃窜。

命令东北野战军利用敌人以为我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入关的错觉，提前秘密入关，迅速突然地出现华北战场上，使敌人来不及逃跑。

平津战役是紧接着辽沈、淮海战役，在华北再打一个大歼灭战，就地全歼傅作义集团。通过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所谓精锐主力基本上都干掉，这是毛主席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但是，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毛主席战略部署，耍了种种手段，妄图使平津战役流产。

一、林彪按兵不动，拖延入关时间， 妄图把敌人放跑

早在辽沈战役胜利前夕，毛主席就打电报给林彪，叫他督促先遣部队提早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出敌不意地对华北之敌进行战略包围，可是林彪却不认真执行。半月以后，毛主席再次发急电指示林彪，要东北野战军主力早日入关。这时，林彪公然对抗毛主席的命令，提出“东北主力入关很困难”，胡说什么：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

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干部滋长了享受思想，部队冬装尚未发下等等，再三拖延入关时间。事实上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对我军广大指战员无耻的诬蔑。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广大指战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趁热打铁，乘胜前进，彻底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当毛主席关于东北野战军向华北进军的命令传到部队，干部战士群情振奋，个个磨拳擦掌，为早日解放华北人民请战求战。在入关途中，很多战士从家门口路过，都不请假，他们说：“解放全中国，是我们革命战士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带着全国解放的胜利消息，再回家看望亲人。”部队入关时，爬山涉水，顶风冒雪，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兼程，各部队都比预定计划提早五至十天，到达平津前线。所谓冬装问题，也是林彪制造的一个借口，实际上部队的冬装大部分早已发下，不足者也完全可以随后运到。林彪一再拖延入关时间，实质上是在东北解放以后，想在那里称王称霸，坐享安乐，不愿继续打仗。他就是要给敌人以时间，让敌人跑掉，破坏平津战役的进行。对此，毛主席给林彪以严厉批评，并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再次限令，“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才排除了林彪的阻挠，保证了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作战。

二、擅自走山海关，有意暴露我军行动，妄图把敌人吓跑

在东北我军主力入关行军路线上，林彪又一次公然对抗

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当时，华北敌军估计东北我军入关必沿北宁线南下，为迟滞我军行动，争取其主力逃跑或固守的时间，在山海关留驻一个军，担任警戒和阻击。为了隐蔽企图保证战役按计划进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有判断，曾多次发电报明确规定东北野战军入关的行动路线。指出：“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你们后尾部队及总部亦不要走山海关。”然而，林彪却无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胡说什么：走山地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又说：大部队南下，敌人有飞机侦察，已无秘密可言。竟擅自命令南下部队一部沿北宁线经山海关前进，明目张胆地破坏我军高度集中统一指挥。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冀东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很好。为保障东北野战军入关，已作了大量物资准备，在长城内外开设了三十多个供应站，筹备了一百万人，十万匹牲口，两个月的粮食和草料。所谓大部队行动无秘密可言，更是站不住脚的，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期，毛主席就曾率领中央红军在敌人二十至四十华里的间隙中运动，保住了秘密，出敌不意地打击了敌人。在莱芜战役中我华东野战军大部队的长途机动，也做到了不使敌人察觉，隐蔽了企图。难道林彪不懂得隐蔽企图和出敌不意的重要吗？！这不过是林彪有意暴露我军的行动，妄想把已成惊弓之鸟的敌人吓跑，破坏毛主席就地歼灭华北之敌的战役部署罢了。由于毛主席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斗争策略，利用敌人的错觉，调动敌人，指示华北野战军主力集中用于平张线，包围张家口，吸引北平敌人的主力西援，分散了敌人对我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的注意力。终于稳住了敌人，保证了平津战役的顺利展开。

三、林彪坚持攻打南口，破坏预定的 作战方案，妄图把敌人赶跑

当时华北敌人逃跑有三个方向，一是从海上南逃，但船只不足，只能逃走一部分。二是向徐州、郑州、西安方向逃跑，这将遭到我各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打击，很难保全力量，因而可能性很小。三是西窜绥远，逃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将拖延战争时间，增加我作战困难。我华北兵团按照毛主席命令，提早行动，将敌人一部，分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首先切断了敌人西窜绥远的退路。在这一情况下，敌人从海上逃跑就成为主要的出路。因此，东北我军主力入关后，攻击方向指向何处？是否符合总的战役意图，是关系到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大问题。对此，毛主席明确规定：“**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点。**”“**基本原则是圍而不打，有些則是隔而不圍，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諸敌都打掉**”。就是要东北野战军首先切断平津之敌的联系，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完成对平、津、张之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敌陷入我天罗地网后，按照战役计划，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予以各个歼灭。这是唯一正确的战役指导方针。但是林彪在我军没有完成对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的情况下，却提出了用先头部队打南口的荒谬主张。这与整个战役的作战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要吸引敌人主力西调，而林彪却要**把敌人往东赶**。当遭到毛主席严厉斥责后，仍一意孤行，擅自命令两个纵队全力向南口急进，后来由于毛主席严令不准先

打南口，才制止了林彪的错误行动。林彪所以要先打南口，这是对当时形势完全错误估计造成的，他不敢用先期到达的四个纵队切断南北，是怕平、津之敌出来夹击。其实这时平张线上已打得很激烈，敌人主力已经被吸引在平、张线上。其他的敌人都心惊胆颤，自顾不暇，根本不可能脱离城市来攻击我军。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其结果就会把北平以东的大部敌人象赶鸭子一样，赶向天津、塘沽，使他们从海上逃跑。

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林彪在平津战役中，开始不愿入关作战，妄图把敌人放跑；以后又有意暴露我军战役企图，妄图把敌人吓跑；最后又要先打南口，妄图把敌人赶跑。一句话，就是不敢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而要按照他的老办法，把平津战役搞成一场击溃战，放虎归山，使敌人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间，得到卷土重来的机会。

平津战役中，我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和广大的武装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战胜了林彪的破坏和干扰，打了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歼敌五十二万余人。宣告了林彪那套击溃战法的破产。

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国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派则兵败如山倒，节节溃退。在解放南京蒋介石的巢穴时，毛主席号召全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九四九年九月，当我军已打到中南地区，即将解放全国之际，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广东战役中又一次大发作。毛主席根据当时的战局，指令林彪要“猛烈攻击，夺取广州。”并指示“要以必要的力量先直出广州、梧州间，切断敌向广西逃跑。”

如发现敌向广西逃跑，要“**不停留地跟踪追击。**”十月十四日我军解放广州，不出毛主席的预料，敌四个军仓惶向西南逃窜。这时，林彪却给正在追歼逃敌的陈赓兵团发了一份急电，说：“如你们已追不上敌人，则望停止追击。”由于陈赓同志和四兵团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不理林彪的那一套，向敌猛追，终于在阳江、恩平地区全歼逃敌一个兵团四个军，又打了一个大歼灭战。

我国历史上一些进步的，有远见的军事家，都把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作为战斗的主要目标，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认为：“胜利的战事出现于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上，失败的战事发生在力量对比的绝对劣势中。”对进攻别国要“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对进攻敌军要“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进攻时要“并力一向”（集中兵力，向敌一点）。这就是朴素的歼灭战的思想。许多法家将帅，如商鞅、吴起、秦始皇、刘邦、曹操、诸葛亮等都是善于用兵，善于打歼灭战的。而那些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则由于政治上的反动腐朽，决定了军事上的右倾保守，无所作为往往打败仗。

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我军建军初期，就规定了“**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就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只有打歼灭战，才能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和壮大自己力量，不断地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缩短革命战争的进程，最后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几十年来，我军在毛主席指挥下，运用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打败了国内外的敌人，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投机革命后，一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在作战问题上，反对歼灭战，推行击溃战。他只求把敌人撵跑，占领地方就算胜利。公开说什么“我军不能采取战略歼灭战，也经常不能采取大型战役歼灭战”，“打成击溃战……也算是胜利”。他抛出来的所谓“一点两面”等六个战术原则，就是反对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全歼敌人，而是把敌人赶跑放走的打击溃战的典型货色。林彪为什么惯于搞击溃战呢？他畏敌如虎，往往被貌似强犬的敌人所吓倒；他看不起群众，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他只图占地盘，不求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目光短浅，主观盲动，毫无战略头脑。因此，长期以来，与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指导思想总是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林彪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追随刘少奇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害怕战争，幻想和平。不愿离开城市，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土地改革中，违犯党的政策搞形“左”实右。在军事上一贯过高地估计敌人，过低地估计自己，消极保守。这是由于林彪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正如毛主席在揭露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根源时深刻指出：“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

“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林彪破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延长国民党反动派寿

命，阻挠中国人民胜利的进程，完全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需要。这与孔老二为了奴隶主的利益，阻挠历史前进是一脉相承的。对于这样的人，正如恩格斯说：“永远应该被視為叛徒。”

全国胜利以来，林彪为了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篡党篡军的罪恶目的，有意顛倒历史，隐瞒在解放战争中的滔天罪行，把自己装扮成“一贯紧跟，一贯正确”。欺世盗名，沽名钓誉，恬不知耻地把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了给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他的死党周赤萍吹捧林彪为“一贯正确的英明领导者”、“非凡的天才”、“统帅”，他的死党黄永胜、叶群、郑维山要在孟家楼为他建造平津战役纪念馆，替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但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被顛倒的历史我们一定要把它再顛倒过来。我们要彻底地剥掉他的画皮，狠批他的反动军事路线，把这个叛徒、卖国贼永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使我军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竭力在我军推行了一条为其“克己复礼”政治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林彪在历史上，一贯追随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对毛主席，危害革命。一九五九年，他当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后，利用窃取的权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一系列修正主义黑货。他乞灵于孔孟之道，承袭儒家的军事思想，以“复古田会议之古”为名，篡改历史，颠倒黑白，从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党的领导、军政关系、光荣传统等各个方面，对抗毛主席建军思想、建军路线的贯彻执行。在这个时期，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暴露的也更加充分了。它对我军的建设，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危害。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

一、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妄图篡夺无产阶级军权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根本

原则，是人民军队永不变质的重要保证，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决定因素。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大造反革命舆论，疯狂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拚命争个人的兵权，妄图用枪指挥党。他们一伙死党，大肆吹捧林彪，炮制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反动谬论。露骨地叫嚣“没有林×××，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公然向党要兵权，要当军队的头，要直接指挥军队。一九六九年十月，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在《“571工程”纪要》中，狂妄地叫嚷要全国武装力量服从他们“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他们颠倒党和军队的关系，鼓吹“军队决定党的性质”，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蛊惑人心地说：“只要军队不变颜色，那么其它党、政出了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他们还攻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破坏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胡说什么“集体领导把个人负责削弱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等等。其罪恶用心，就是要把林彪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把军队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用枪指挥党，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没有一个不是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拚命抓个人兵权的。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德怀的“一长制”等等，都是反对和妄图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结果，没有一个不是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的。我军四十七年的斗争历史充分

证明，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军队。有了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我军就胜利，就前进；离开了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我军就遭受挫折和损失。林彪一伙胡说我军是林彪直接指挥的，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军队中党的各级组织来实施的。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发挥大多数人聪明才智，防止个人独断专行、篡夺兵权的重要措施。林彪大嚷大叫“三个和尚没水吃”，不过是孔老二“君子必慎其独”的翻版。林彪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兜售“英雄创造历史”，根本不相信广大群众的作用。他攻击党的集体领导，目的是要他这个自比“天才”“天马”的“英雄”，出来包办一切，没有他这个“英雄”，不仅“没有水吃”，甚至地球也要停止转动。有了他的“一声号令”，“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自然，“党、政出了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军队才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失去了党的绝对领导，军队前进就没有方向，建设就没有灵魂，就会由无产阶级军队蜕变为资产阶级军队。林彪胡说党变了色，军队还可以不变，纯粹是欺人之谈。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背叛，马列主义党变成了修正主义党，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也随之变成了对内残酷镇压革命人民、对外疯狂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军队。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党决定军队的性质，而不是军队决定党的性

质。林彪制造军队决定党的性质谬论，目的是要颠倒军队和党的关系，要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枪指挥党，用军队来对付党、政、民，把军队变成他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毛主席在巡视南方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妄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其结果是，一切都指挥不了，一切都调动不了。醉心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最后摔到了地上，落得个身败名裂，粉身碎骨，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二、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妄图改变我军性质

我军是无产阶级军队，担负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历史使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部队头脑，进行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我军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大计。

用哪个阶级的世界观，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改造军队，历来是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军历来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部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做为我军建设的根本任务，因而，使我军始终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改变我军的性质，疯狂破坏我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妄想篡改我军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抽掉我军建设的灵魂。他恶毒攻击马列主义“过时了”、“离我们太远”。

“马列的书太多，读不完，读不懂”，妄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否定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同时，又以“走捷径”为名，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他以“背警句”、“学语录”为幌子，反对我们学习原著。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三十字”黑方针，破坏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鼓吹“用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学什么”，反对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妄图使我军广大指战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成为理论上的盲人，政治上的庸人。在林彪“三十字”黑方针的毒害下，造成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的局面，“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的科学，也是我军建设的灵魂，行动的指南。因此，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建设部队。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设军队，最根本的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进行党的路线教育。林彪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极端仇视和反对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他用所谓“抓活思想”，代替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总政策的教育，用儒家腐朽没落的思想，作为毒害部队的思想武器。他效法孔孟的“中庸之道”，宣扬“和为贵”，攻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做绝了”，“斗绝了”；效法孔孟的“忠君”、“无违”思想，提倡绝对服

从，大搞“忠”字化活动；效法孔孟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鼓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效法孔孟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反动处世哲学，叫嚷“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效法孔孟轻“小德”的说教，宣扬“小节无害论”，等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束缚革命战士的精神枷锁，使广大指战员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和总政策，在革命的征途中，只管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以便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开方便之门，把我军建设引向邪路。毛主席教导我们：“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我军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对于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把路线搞正确，我军建设才有明确的方向，只有对广大指战员经常进行路线教育，才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分清真假，明辨是非，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推行反革命组织路线，拉山头，搞宗派，破坏我军的团结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也是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策略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林彪为了适应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竭力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组织路线。抛出所谓识别、选拔、使用干部的“三条”黑标准，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提出的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相对抗。他所谓的“高举”，就是高举修正主义黑旗；他所谓的“突出”，就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他所谓的“干劲”，就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拼命效劳。他还大叫大嚷：“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该升的升，该降的降。特别是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以对林家的态度、感情为标准，大搞“划线排队”；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拼凑以他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只要跟他们的就是“感情深”，“大节好”，极力提拔重用。反之，就排斥打击，置于死地。他们还用多方串连，吹吹拍拍，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相等卑鄙手法，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服务。

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最根本的就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这是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是使我党我军永不变色的基本保证。林彪的黑“三条”，根本不讲马列，不讲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讲团结。其要害，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拼凑反革命政变的黑班底，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伙同他的死党黄、吴、叶、李、邱以及李雪峯、郑维山，极尽制造分裂之能事，破坏我党我军的团结统一。他

们恶毒地编造了所谓“军队受压”，“笔杆子压枪杆子”的谎言，别有用心地挑拨军政之间的关系，煽动部队不满情绪。郑维山追随林彪、陈伯达一伙，在他们授意和支持下，大搞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积极经营山头主义窝子，篡夺北京军区的领导权，为他们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在军队和地方的关系、部队和部队的相互关系上，他们别有用心地划分什么：“这股力量”和“那股力量”，“这个山头”和“那个山头”，“上层”和“下层”，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反党乱军，破坏军政、军民一致和官兵团结。

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拚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还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他把孔老二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乔装打扮，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狠下毒手。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制定了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等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

毛主席指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林彪为了分裂我党我军的团结统一，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结果是他们一小撮死党被分裂出去。“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林彪正是以搞

阴谋起家而又以搞阴谋破产的。十次路线斗争证明，毛主席的历来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因此，任何野心家、阴谋家妄想破坏我党我军的团结，都是不能得逞的。相反，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兴旺。

四、鼓吹军政对立，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妄图削弱我军战斗力

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是保持我军建设方向，把部队建设成一支能文能武的战斗队的重大问题。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坚持政治和军事的辩证统一观点，一贯反对军事脱离政治的错误倾向。认为，政治和军事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原则，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军事，这是我们判别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唯一准则。

叛徒、卖国贼林彪，极力散布军事与政治对立的谬论，制造思想混乱，要把部队搞空。一九五九年他当国防部长不久，就鼓吹军事第一，技术第一，大搞单纯军事观点。他胡说：“最大的政治就是军事”，“军事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要用军事代替政治，反对政治领导军事和军事服从政治。在他的煽动和策划下，一九六四年，掀起了全军的军事“大比武”。当这股歪风受到毛主席和广大指战员坚决抵制后，林彪摇身一变，由“大比武”的黑后台，变成了反“大比武”的“英雄”。拼命鼓吹有了政治“就一有百

有”，“政治可以冲击军事”，“精神可以代替物质”，说什么“军事训练差一点不那么严重”，“枪打得准不准是次要问题”。妄图效法孔孟“废力尚德”、“偃武修文”的虚伪说教，取消无产阶级军事，削弱我军战斗力。与此同时，他还在部队广泛推行“四好”运动，妄图以“四好”为纲，代替路线为纲，抽掉我军建设的丰富内容，歪曲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在这一运动中，他又搞了许多诡辩，使部队在“一好”与“三好”的关系上，一直纠缠不清，争论不休。并且规定一月一检查，半年一初评，一年一总评，这样，光评比就占去一年的四分之一时间。结果，越评部队越不团结，越评锦标主义越滋长，越评军政训练时间越少，严重地败坏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更为恶毒的是，他把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归结为“一条是突出军事，一条是突出政治”，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上进一步制造混乱，妄图使人们看不清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阶级实质，把握不住斗争的正确方向。

林彪采取卑劣手法，制造军政对立，要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互相“冲击”，其目的，是妄图破坏我军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能文能武的战斗队建设，把部队搞空。恩斯格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林彪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军事，说穿了，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军事，同时也“冲击”无产阶级政治。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和在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时，对他们秘密组建的“联合舰队”、“小分队”、“技术小组”等法西斯特务组织，总是拼命加紧军事、业务训练，拼命进行“忠于”林家父子和“江田岛精神”的反革命思想教育。

看，他们把反革命政治和军事结合的多么紧密，协调的多么合拍。这一事实，为他们制造军政对立的罪恶目的，作了最好的注释。

五、推行“六个战术”，妄图取代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正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出的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作战方法。它是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是克敌致胜的法宝。叛

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硬把“六个战

斗条令，要作为训练部队的“六个战术”来推行，硬把“六个战术”吹得天花乱坠，要作为训练部队的“六个战术”来推行，硬把“六个战术”吹得天花乱坠，要作为训练部队的“六个战术”来推行，硬把“六个战术”吹得天花乱坠。他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说：“只要采用这种办法，横直能打胜仗。”尽管林彪把“六个战术”吹得天花乱坠，但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六个战术”掩盖不了十大军事原则的灿烂光辉。

林彪的“六个战术”，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炮制出来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是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组成部分，它与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十大军事原则的作战指导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一指导核心贯穿于十大军事原则各条的始终，是十大军事原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六个战术”推行的是击溃

战、消耗战。林彪曾叫嚷：“即使打成击溃战、对峙或两下撤退的仗”，也“算是完成任务，算是胜利”，甚至恶毒攻击歼灭战“是不容易达到”的“神仙仗”。

十大军事原则在兵力部署上，是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六个战术”是搞点上兵力集中的绝对化。林彪说：“主要方向用九分之七甚至九分之八，次要方向用九分之二甚至至少到九分之一”。他这样部署，既便于敌人在主要方向上节节抗击，也便于敌人在次要方向上乘隙逃跑。同时，他还反对四面包围敌人，说：“四面包围敌人是逼迫敌人作困兽之斗”，因此，要“围三缺一”，给敌人留出生路。在这里，林彪把古代兵法中“围师必缺，穷寇勿追”等糟粕拣了来奉为至宝，推行他的击溃战，对抗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

十大军事原则在作战形式上，强调运动战，并把它作为我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六个战术”各条都是讲的攻坚战，阵地战，强调拉开架子打“堂堂之阵”，这和古时候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坚持“不鼓不成列”，结果大败于楚是一样的可笑。毛主席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是对历史上儒家用兵的批判，也是对林彪右倾机会主义军事思想的批判。

十大军事原则在作战指挥上，是立足于全局观念和集中统一指挥；林彪在推行“六个战术”时，竭力进行对抗和破坏。他说：“‘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他把“慢”

当作“包打胜仗”的“原则”，并说：“没有准备好不执行命令不打是对的”。大搞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分散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在战斗作风上，强调在正确路线指导下，革命英雄主义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统一；“六个战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立场出发，大肆鼓吹不顾一切的“冒险”，不讲战术的“死打”和乱撞乱碰的“蛮干”。林彪象亡命徒一样狂叫：“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推行的完全是拚命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贯穿着唯物论和辩证法，如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需要与可能、歼敌与夺地，等等；“六个战术”推行的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林彪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战争，把战略战术看成是僵死的、不变的。他把某种情况下的打法加以绝对化，说成是普遍的规律，把战场上千变万化的情况和多种多样的打法，机械地规定为“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把随机应变的战斗编组和战斗队形，刻板地规定为“四组一队”和“三三制”，等等。他这些东西，完全是违背军事辩证法，根本不是什么“各种战斗的原则”，而是十足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孔老二“生而知之”唯心主义的货色。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人民解放军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全国胜利，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运用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结果。林彪的“六个战术”，为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决定，过去打不了胜仗，今后“横直”也打不了胜仗。还是让欺人瞞世的“六个战术”和林彪一块见鬼去

吧！

“我們不但需要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綫，而且需要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軍事路綫”。我軍两条軍事路綫斗争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彪的资产阶级軍事路綫，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軍事路綫是格格不入的，是根本对立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軍事路綫，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和以此为骨干的人民武装力量，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和战术，进行人民战争。林彪的资产阶级軍事路綫，是为了剝削阶级少数人的私利，脱离和反对人民群众，妄图改变我軍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取消人民武装力量，实行消极保守的战略战术，反对人民战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軍事路綫，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反映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必然把革命事业从胜利引向胜利。林彪的资产阶级軍事路綫，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基础上的，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代表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与我軍的无产阶级本质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必然遭到彻底破产。

林彪在我軍推行的资产阶级軍事路綫，给我軍建设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对它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但是，必须肯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軍事路綫在我軍始终占着主导地位。我軍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軍事路綫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是永远向着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在两条路綫激烈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十分关怀我軍建设，在关键时刻及时给

我軍指明方向，引導全軍指戰員同林彪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和有力的抵制，使我軍在同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浪中，經受了考驗和鍛煉，取得了偉大勝利。特別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我軍廣大指戰員一切聽毛主席、黨中央的指揮，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妄圖篡奪無產階級軍權，策動軍隊起來造反的迷夢。真正死心踏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的只是他幾個死黨。林彪反黨集團搞反革命陰謀活動，是背着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背着我軍廣大指戰員干的，他們有個發展和暴露的過程，我們對他們也有個認識過程。“當着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九·一三”事件後，隨着批林整風，批林批孔運動的不斷深入，部队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和“只搞文不搞武”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我軍的優良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發揚，部队的戰備、訓練、施工、生產、執勤等各項任務取得了顯著成績。事實雄辯地證明，“撼山易，撼解放軍難。”我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是一支能文能武的戰鬥隊。是不愧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締造和指揮的無產階級軍隊。

毛主席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历史階段。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貫穿在整个社會主義历史階段，社會上的個兩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林彪反黨集團的垮台，並不是黨內路線鬥爭的結束。今後還可能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我們一定要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牢記黨的基本路線，認真